

## 印度世界精神组织嘉年华会 法轮功受欢迎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四日至七日，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办的世界精神组织的嘉年华会上，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表演，受到来宾们的欢迎，主办单位为法轮功学员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奖牌并献上哈达致谢。

艾哈迈达巴德是印度第七大城市，有着著名景点阿布山。此次盛会在阿布山下的大型庄园内举行，数千位来自印度与世界各地的博士、医生、公司总裁及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参加。

嘉年华会在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的壮美乐音中开幕，大会主席致词时说：“谢谢天国乐团，这些来自天国的使者们，带给了我们神圣的讯息。”

印度法轮功学员向来



天国乐团在印度阿布山下演奏 右图：主办单位向天国乐团代表颁发奖牌并献上哈达

宾介绍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简单易学的功法。上亿人通过修炼达到了身心健康。他们并讲述了法轮功学员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的真相。来宾们表示这种践踏人权的事情不可思议，纷纷签名表示反对活摘器官，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在第二天的大会中，天国乐团成员上台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祥和的气氛充满了整个会议厅。与会者对学炼法轮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位年长的博士急切地询问哪里可以找到《转法轮》等相关著作。闭幕式当天，大会秘书长特地向天国乐团成员致谢，并用英语说“法轮大法好”，他还说：“任何人都不应暴力迫害善良和平的好人，邪恶不久就会走到尽头。”◇

## 澳洲最大英文媒体揭大批患者去中国换器官

（明慧记者夏纯清墨尔本报导）近日，墨尔本一位肾脏外科医生在接受澳洲传媒巨擘费尔法克斯媒体（Fairfax Media）记者采访中提到，他的病人成团大批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死刑犯人数，间接印证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暴行。

费尔法克斯媒体旗下的墨尔本《时代报》和《悉尼晨锋报》，二零一三年十月五日刊登了署名记者赛亚的文章，文章说全澳大约有一千六百名病人在等待器官捐赠者，但捐赠者的数量远远不够，在二零一零年，每一百万人口中只有13.8人捐献。

澳洲肾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四年，当患者苦苦等待器官的时

候，“在中国可以很快找到匹配器官”的说法在患者的圈子里流传着。

费尔法克斯媒体记者询问古德曼医生有关器官移植旅行的事，是否有过肾透析患者突然消失，两个星期后再次出现，躯干上多了一道疤痕？

“很多次，”古德曼医生说，“大约五年前，他们集体去了中国，回来后带着移植好的新肾脏。据说，捐献者是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而且血液和组织类型早已经匹配了。”“我强烈反对器官移植旅行，”古德曼医生说，“这对捐献者是一种侮辱。”

中共每年处死的犯人在两千到三千人，而中共公布的数据显示，二零零五年中国有两万个器官移植手术；二零零八年中国肾移植累计八万

六千八百例，肝移植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三例，远远超过死刑犯的数量。

澳洲《新闻周刊》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登载了评论文章《中国可怕的器官盗窃：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文章中指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那个‘屠宰店’，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谈论它。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被强制摘取器官’。”“中国所提供的移植服务，只有‘应订单来杀戮’才能做到这样的供应。”

《国家掠夺器官》一书的作者之一、悉尼大学教授玛丽亚·辛格说：“任何情况下，病人都不应接受这样的器官，因为这违反基本道德良知，是反人性的。”◇



# 走出怨恨 迎来崭新人生

【明慧网】刚结婚的时候，婆婆就告诉我，要煮三餐，要伺候婆婆、小姑、小叔，她的要求我照单全收，但是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法让婆婆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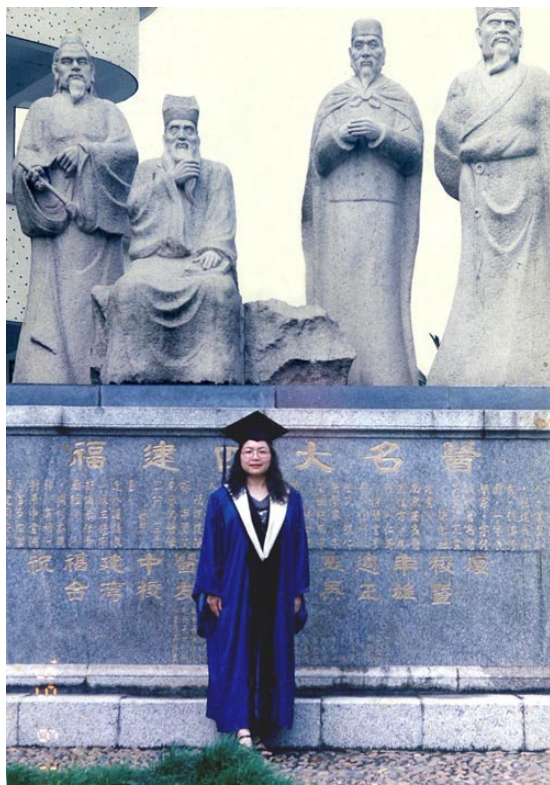
一天，丈夫的堂嫂来访，婆婆听到堂嫂的叫门声就冲进厨房，我正在洗碗，她一下把我推开，自己洗起碗来，等堂嫂走进厨房，婆婆就跟她说：“你看，我娶这个媳妇，饭也是我在煮、碗也得我来洗，她什么都不做！”

怀孕期间，我孕吐得很严重，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全身无力，无法正常做家务，婆婆却对我大吼：“骗人没生过孩子啊！不要装了，赶快去煮饭！”

我不明白为什么婆婆总是这么对待我，对她的怨恨与日俱增。婆婆是个烧香拜佛的人，对人却如此不善，我从心里反抗着她。

我母亲经营中药行，我对中药也很感兴趣。一九八九年，我有机会前往大陆学习中医学，此后十年的时光，我两地奔波，于一九九九年研究生毕业。

此后，我也跟母亲一样开店经营中药材。一天，顾客王小姐很热心地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转法轮》，我不好意思拒绝，就把书收下，但一直没有看。



台湾的杜鹃女士

直到有一天，我拿起《转法轮》阅读，这一看感到非常震惊，书中讲述的做好人的道理深奥又简明易懂，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正是我人生疑问的答案！我激动地打电话给王小姐，感叹世上竟然有这样一本书！

法轮功改变了我的人生，最大的改变是由怨恨婆婆转而感谢她。做到这一点很难，我能做到，凭借的是法轮大法的力量。

我读到李洪志老师在《澳大利亚法会讲

法》中讲的：“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这时我对自己十分懊恼，因为婆婆还算不上是什么敌人，我竟然无法爱她，这怎么能行？

我试着去理解婆婆，看到她的一生确实受了很多苦，我开始怜惜她，从对她的善意理解中又生出了更多的宽容。另一方面，我开始感谢婆婆，当初正是因为她，我才在逆境中被激发出超常的毅力，在漫长的岁月里完成了医学教育，学得一技之长。

最后我发现，我已经原谅了婆婆，也解脱了自己。

如果没有大法，我还浸泡在怨恨里，自己都快成了跟婆婆一样的病态者，思维被气恨的情绪牵动着，十分痛苦。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做到“先他后我”、“先为别人着想”，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让我变得理智、包容。而我发现，所有对他人的善心善行，最终都会回报到自己身上。

遵循“真善忍”去修炼，我的智慧也不断被开启，对各种专业知识，包括医书里没有的、教授没教过的、临床没学到的，都有所领悟。法轮大法让我迎来了崭新的人生。（文/杜鹃）◇

## 炼法轮功一个月 尿毒症痊愈



【大陆来稿】二零一三年五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云南打工的刘重生（化名）忽然被腰痛折腾得死去活来，翻来滚去一夜未合眼。第二天一大早他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支撑着病体回到湖南澧县老家。妻子和儿子急忙将他送到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尿毒症，高血压（200/100mmHg），双肾肿大，肾功能丧失，排尿困难。医生让他立即住院做透析。

刘重生陷入两难境地：俩口子靠打工挣钱，透析得花多少钱啊！签字住院吧，没钱；不签吧，人家不给治，怎么办呢？想到炼法轮功身体健康的妻子，他挣扎着爬起来颤颤巍巍地走进医生办公室对妻子说：“咱回家吧，你带我炼法轮功。”

医生把他妻子拉到一旁说：“放弃治疗等于是等死，

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妻子将医生的话告诉了丈夫，刘重生拔掉手上消炎的针头说：“走，咱回家。”

回到家，妻子安顿他躺下，放李洪志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给他听。听着听着刘重生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他认真地跟着妻子体重从入院时的一百二十斤增到一百五十多斤。

夫妻俩到医院去复查，检查结果：血压由入院时的200/100mmHg降到140/80mmHg，肾功能指标一切正常。

手捧报告书，刘重生兴奋地喊学炼功法动作。刚开始，只能傍着床沿比划；第二天能站直身子炼了；第三天腰不那么痛了，也能吃东西了；到第十天左右，能正常排尿了；不到一个月，“法轮大法好”，在场的医生、护士都啧啧称奇，说：“炼法轮功一个月，尿毒症不治自愈。法轮功真神了！”◇

## 广州法轮功学员朱洛新自述受迫害经历

【明慧网】朱洛新，女，广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被中共绑架后非法判刑十年，饱受折磨。丈夫吴志平曾被非法劳教两年，后背井离乡，移居芬兰。朱洛新于二零一二年才和别离十一年的丈夫在芬兰团聚。

在中共十四年的迫害中，朱洛新一家有六人因坚持信仰法轮功而被中共非法判刑、劳教、关押洗脑班，期间有两位老人在迫害中离世。以下是朱洛新自述遭迫害经历。

我叫朱洛新。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日，我被跟踪拿资料同修的便衣警察绑架；之后十四天里，警察把我关押在一间软皮墙的审讯室内。我被强迫坐在一“老虎凳”上，被几十名警察和便衣警察二十四小时车轮式提审，不许睡觉、上洗手间等。警察想通过摧毁我的精神，在我肉体极度疲劳状态下，乘机获取其他法轮功修炼者的信息。当时我一直以绝食抗议他们的迫害。最后，以“零口供”被转入广州白云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在广州白云区看守所，我被戴上 30~40 斤的铁脚镣，吃、喝、拉被固定一处长达半个月，脚镣都陷进肉内。被卸下脚镣后，过了好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行走。警察用这种酷刑折磨过我多次。

二零零二年一天，我被非法关押的 211 监仓，突然被放进十多个在押人员，后来她们告诉我说，她们原来是在隔壁 210 监仓，由于有一位法轮功学员（郝润娟）绝食反迫害，被警察灌食期间迫害致死。所有知道郝润娟死因的在押人员，都被警察强迫写一份假口供，证明“郝润娟是病死的”，否则她们都不能离开。当时我知道此事后痛哭了很久。

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中共对我进行秘密开庭并非法判刑十年。二零零三年将我劫持到韶关监狱，后转押到广东省女子监狱。

当时是零下 2~3 度的气温，他们只让我穿件单衬衣，到监狱后，我立刻就被关到禁闭室，那里大约 2~3 平方米的，里面只有一水泥地板和一个

在地面挖一个洞的“洗手间”。在那样恶劣的环境，我被关押十四天，只要我炼功，马上就有犯人开锁冲进来对我进行打骂、阻止。

狱警发现用硬的手段对我不起作用后，就转为长期把我关在一间小房内，每次由轮班的吸毒犯人昼夜长时间播放中共诬蔑法轮大法的录像，指使夹控不停的读诬蔑大法的资料。由于我不“转化”，她们就长期不让我正常上洗手间和睡觉，狱警更不让我接触任何其他人。

一次，狱警把我从禁闭室带到某监区，强迫我看诬蔑大法的内容，我不看，一边背诵《论语》，一边去撕诬蔑大法的墙报，一狱警指使犯人阻拦我，并把水泼在我所站立的地上，当狱警用电棍电击我时，我听到那狱警一边开电棍一边说：“怎么没反应？”后来恶警就放弃了。这次经历使我体会到发正念灭邪恶的威力。之后，狱警安排夹控犯人读诬蔑资料时，我对其发正念，对方多次读着读着就读不出声，最后只好放弃。

二零零四年一天，我被夹控犯人拖到楼下大厅，当时约八名犯人在场，会场前方写着某某现身说法等字的横幅，我知道又有学员承受不住酷刑迫害而被迫“转化”。发正念片刻后，在会议还没有开始前，我突然站起来，大声喊师父教的发正念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现场的电灯全灭，大厅外面电闪雷鸣约半小时。当时十多个狱警和服刑人员强行把我拖出大厅，并将我双手吊铐在铁栏杆上，该揭批会也就草草收场。当晚我被通宵吊铐在铁栏杆上，人不能站直和坐下，非常痛苦。

二零零四年年底一天，监狱“610”为迫使我放弃真、善、忍的信仰，把我七十岁高龄的父亲从家里用轮椅拉到监狱，威胁我放弃信仰。父亲当天因糖尿病和高血压病情严重，已经约了医生，但还没看病就被“610”恶徒硬拉走。当我看到坐着轮椅里身体极度衰弱的父亲泪流满脸，心如刀割。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只是伤痛地

看着我，不断地流泪，默默地支持他的女儿。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我完全没有想到中共为了强迫我放弃信仰，竟会对我的亲人做出如此没有人性的事情。

由于受不了亲人遭到如此的迫害，我违心写下“四书”。当天自己就象掉入了万丈深渊，生命变得空空的，每天都生不如死。这是我修炼路上的污点，给大法抹黑。后来自己经过静思、反省、向内找，必须放下怕心方能继续走修炼的路。我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每天不断背法，发正念否定和铲除邪恶安排的一切因素，慢慢的正念越来越强。我请出监狱的学员帮忙在“明慧网”上作严正声明。后来，狱警多次找我表态，我明确一点：我修大法没有罪。之后狱警就没有再提起此事。但是直到我离开监狱的当天，狱警都安排夹控者监视我的一言一行。。

二零零五年一天，我拒绝操练。狱警指使数位吸毒犯人，当着八百犯人的面，把我抬起抛到半空，狠狠摔在地面。很多犯人都为我哭泣，每次我被抛起时，在场有不少人都说：坏了坏了，别再抛了。现场的狱警却阴笑着说：“你是罪人，就得服从安排，否则就惩罚你。”狱警对我多次进行这样的折磨。事后身边的服刑人员非常佩服地说：只有法轮功学员是最正的，不怕共匪。都发自内心地佩服大法弟子。

在被非法关押的最后三年，我被迫长时间做奴工产品，做出口的手工毛线的绣花产品。

二零零九年九月底，我结束冤狱回家。才知道我那曾担任广州市某医院的副院长、已经七十岁的婆婆吴玉娴因不放弃信仰，被中共“610”人员绑架，连续审讯两天三夜，导致大出血，后被恶警扔到南宁火车站。婆婆自行回家后，不久于二零零六年二月九日含冤离世。

婆婆六十多岁的妹妹、江门第一中学的退休老师吴玉韞，也因坚信大法遭中共“610”人员关进洗脑班三次迫害。在最后一次，回家不久也含冤离世。中共把我们美好和睦的家庭，迫害得支离破碎。◇



# 无愧良心 才能活得坦然

今年九月之前，罗马尼亚八十八岁的前典狱长亚力山德鲁·维西内斯库还过着悠闲的日子，他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和政府配给的舒适公寓。

但他的好日子在九月初结束了：布加勒斯特的检察官宣布，他将因在共产党时期的暴政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审判，他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这是罗马尼亚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推翻并处决了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之后，首次审理此类案件。

在他管控的监狱中勉强活下来的犯人们的记忆里，维西内斯库是一个残忍的施虐狂。前劳役营典狱长扬·菲乔也受到调查，并可能面临指控。

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的罪犯，终会被清算。

在中国，中共江泽民集团因为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不同于中共信奉的假恶斗，而发动了残酷的迫害运动，中共甚至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同时干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如今，迫害元凶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已在世界三十个国家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控告。欠债必还，这是上天制定的法则。上天也以种种途径向世人昭示了“天灭中共”的天意，并给人指出“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坦途。望追随中共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多思量。◇



当年酷刑折磨政治犯的 Ramnicu Sarat 监狱。①当年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监狱服务的维西内斯库 ②88 岁面临审判的维西内斯库



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央视镜头显示，刘春玲是被打死的。①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的头部 ②重物猛击刘的头部之后被弹起 ③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 一位医务工作者的回忆

【明慧网】我是一个全国知名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中共在死刑犯身上活摘器官的做法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以下是我亲眼所见。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科室领导派我去取一块人体组织，作为实验室切片用。我来到病房大楼一楼的房间，床上躺着一位约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从裸露的双下肢看，他身体非常健康、结实。我去时，见他的胸腹已被切开，肝、肾等器官已被取走，一位眼科医师正在取他的眼角膜。我向主刀医师要一块食道组织，当医师在他胸部切取时，我突然发现

他的左小腿在抽动，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这是活体摘取器官。我小心翼翼地将他们取下的食道组织放在纱布上，食道上有许多鲜血，软软的，还有一些温热。

这时外科医师抬起头来向周围的人嚷道：“还有没有要组织的，赶紧啊，我们要缝合伤口了……”我听旁边人说，男青年是个死刑犯。那场面、那架势，活像在屠宰场一样。

即便是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啊！

医师们拿着需要的器官陆续离开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所以多留了一会儿。我看到死刑犯的胸腹部切口被缝上后，主刀医师和助手离去。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走上前来，双手捧起手术床上的鲜血，“啪、啪”地往死刑犯的脸上撒，做成犯人被处死时鲜血喷溅在脸上的假相，另一名警察赶快对着犯人面部拍照。一切完成后，警察将尸体用厚橡胶布裹严实，放在手术室的墙角，待送火葬场。

后来听人说，许多医院都与法院套近乎、拉关系，就是为了开展这种私下交易，医院取得新鲜的器官用于移植、实验等，而法院也能从这样的交易中得到非常丰厚的“回报”。

这样的邪恶交易二十多年前就在中国大陆各大医院普遍发生着。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都很难过，行医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这种对生命极不尊重的行为，令人何等悲哀！我们真应该深深地反思，不再与邪党为伍，重拾生命的尊严，重拾医者的仁心。◇



油画《活摘器官的罪恶》